

成长小说《女勇士》的叙述策略

莫翠华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是一部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在女主人公成长过程中, 她必须面对来自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社会阶级等方面的多重压力, 因而她的成长过程非常艰难。作家通过使用多重叙述视角、后现代复调叙述与拼贴以及将成长与反成长叙事并置等手法, 再现了少数族裔女性成长的复杂性,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成长小说这一经典模式。

关键词: 女勇士; 少数族裔女性成长; 叙述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2)01-0057-05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Bildungsroman *The Woman Warrior*

Mo Cuihua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Woman Warrior* is a bildungsroman reflecting the hard initiation of an American minority girl who suffered a lot from the joint pressure of racial and gender discrimina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writer,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tagonist's growing up, employs such narrative strategies as the multi-point of view, post-modernist narration, and the juxtaposition of Bildung and anti-Bildung, and by doing so, she also puts new energy into the classic pattern of bildungsroman.

Key words: *The Woman Warrior*; initiation of minority woman; narrative strategy

美国的主流文化是以基督教、白人为中心的盎格鲁文化, 它排斥并力图消解其他种族的文化个性, 但是伴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兴起, 少数族裔的声音越来越受到关注, 少数族裔女性的成长问题也渐渐受到注意。对于美国的少数族裔青少年来说, 如何面对种族歧视, 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是他们共同的成长难题。而少数族裔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则是来自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 所以她们在找寻自我之路上更加举步维艰。汤亭亭的《女勇士》正是反映这种艰难成长过程的一部小说。汤亭亭是美国华裔文学的领军人物, 她的《女勇士》发表于 1976 年, 并获得该年度“国家图书批评界奖”非小说类最佳图书奖, 成为美国华

裔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小说中的女儿“我”成长于唐人街父母开办的洗衣店里。主流文化对华裔的歧视, 华裔群体对女性的贬低, 以及“成长引路人”——母亲, 一会儿是冲破封建传统的勇士, 一会儿又是封建传统的代言人的矛盾角色让她困惑不已。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 她的成长过程尤为艰难, 非常具有代表性。

台湾冯品佳教授认为: “少数族裔女性有关少数族裔女性身份塑造的任何写作, 不管是以小说还是以自传的形式, 不论主题是按时间顺序的还是回忆形式的都可以看作是成长小说。”^{[1][15]} 她还分析道: “少数族裔女性由于自我身份的模棱两可所承受的压力比少数族裔男性更大, 因为她们还有另外一

项重任——在性别歧视的约束下阐释自己的美国经验。”^{[1]16} 她将汤亭亭的《女勇士》看作是一部反映少数族裔女性成长的小说,并且在她的著作《对托尼莫里森和汤亭亭的女性成长小说的后现代解读》中,对比了莫里森和汤亭亭叙述手法上的异同。内地也有不少学者将《女勇士》纳入女性成长小说的范畴。

国内外很多学者的论证旨在于证明《女勇士》是一部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因为它具有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本文将在认同《女勇士》是一部少数族裔女性成长小说的基础上,分析《女勇士》的叙述策略及其对成长小说这一模式的丰富和发展。

一、多重视角

成长小说的叙述视角大多数是第一人称,往往是已经成年的叙述者回顾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难忘的经历,而且这些经历影响了叙述者“我”的性格成长,但是《女勇士》的叙述视角则比较复杂。《女勇士》主要采取第一人称叙述,但是有些章节却是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另外,这部小说在叙述同一个对象时往往交织着不同的叙述眼光,例如“我”的眼光、母亲的眼光。其次,它的第一人称视角比较复杂,往往有两种目光(童年的“我”和成年的“我”)交织。

北京大学的申丹在研究不同叙述视角的分类、性质及其功能的时候提出:“若要合理区分视角,首先必须分清叙述声音与叙述眼光……‘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眼光’指充当叙述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即叙述者使用人物的眼光来叙述。”^{[2]201}

《女勇士》作为一部回顾性的成长小说,它的主要叙述者是主人公“我”,它的“叙述声音”是现在的“我”,但是“叙述眼光”非常复杂,各个章节都有所不同:1)无名女子,讲述了姑姑的故事,“叙述眼光”有母亲、童年的“我”和现在的“我”;2)白虎山学道,主要是女儿想象自己成为花木兰的故事以及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叙述眼光”有童年的“我”和现在的“我”;3)乡村医生,介绍母亲“勇兰”在中国学医和行医的勇敢经历以及“我”与母亲现在的关系,“叙述眼光”有现在的“我”和母亲;4)西宫门外,用母亲的眼光叙述姨妈月兰的故事;5)羌笛野曲,主要叙述“我”艰难发声的过程、我的妥协以及蔡文姬的隐喻,“叙述眼光”有童年的“我”和现在的“我”。

作者在叙述同一个对象的时候往往交织着不同的叙述眼光。以第一章为例,姑姑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方位的阐述,有母亲的眼光也有童年的“我”和成年的“我”的眼光。母亲显然已经内化了男权社会的种种标准,她的叙述主要目的是警示女儿不可越雷池半步。而听过故事几十年后的女儿,也是书中故事叙述人的“我”,则提出了众多的猜测、思考、评说、反讽与质疑,她以完全不同的语气叙述了几种不同版本的故事。童年的“我”想象有可能姑姑是强奸的牺牲品,她是一个典型中国旧社会式的逆来顺受的女人,男人下命令,她只好服从,她恐惧、不敢反抗,最后被逼无路只好抱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投井自杀;青春期的“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描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姑姑:她思想开放,爱打扮,崇尚爱情自由,怀孕后为了保护爱人不受到伤害,坚决不说出他的名字,最后为了爱情独自牺牲自己;成年的“我”不愿意参加父母亲戚对姑姑的惩罚,违背母亲的告诫,“舍得为她破费纸张”^{[2]15},叙述她的故事。成年的“我”试着理解姑姑分娩时的悲惨处境,详细描述姑姑独自一人在猪圈分娩时的情景以及姑姑当时的心理过程。在她的描述下,处在如此凄惨处境下的姑姑身上依然洋溢着母性的光辉,连最后带着孩子跳井自杀也是出于保护孩子不受欺侮的本能。

作者这样的叙述方式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读者可以分析和比较“母亲”视角和“我”的叙述形成的巨大差异。同时,“我”的三种不同叙述眼光也清晰地反映了我的成长轨迹:对母亲所讲的中国故事以及母亲所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文化从最初的恐惧和疏离到质疑再到成年之后的反思。

另外,在“我”叙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的时候,往往有两种目光交织,一是童年的“我”的目光,一是现在的“我”的目光。对于叙述视角的这种现象,申丹也有详细的阐述:“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知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2]238} 经验自我的视角“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经历事件时的内心世界。它具有直接生动,主观片面,较易激发同情心和造成悬念等特点”^{[2]260}。

《女勇士》以经验自我的眼光叙述童年时的经历、心理感受和想象,以叙述自我的视角叙述成年后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和评论。在叙述“我”成长经历的时候,作者使用的经验自我的眼光可能是片面的、幼稚的,但是它真实地再现了“我”童年时的心理状态和种种困惑。

例如在小说的第二章,童年的“我”深受母亲讲的女侠故事的影响,在实际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也做起身怀绝技、抱打不平的美梦。作者在这里主要采取第一人称经验视角来描述“我”童年的想象,将读者直接引入“我”童年时的内心世界。为此,作者还刻意使用了一些非常孩子气的语言以及童年时比较片面的理解方式。第二章一开头:“当我们中国姑娘听大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了解到长大了不过当别人的妻子或佣人,那真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可以当巾帼英雄,女剑客。无论谁伤害了女剑客的家庭,即使打遍天下,她也不会善罢甘休。也许过去的女人是危险的,所以不得不把她们的脚缠起来。”^{[3]16}接着,后文使用很大篇幅讲述了花木兰的故事。故事里面充满了孩子式天真和离奇的想象。

现实生活中歧视女性的传统以及种族主义让“我”处处受到压抑,在描述性别歧视给“我”带来的压力的时候,作者也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经验视角,例如:“我想象不出老家会是什么样子。重要的是我得成就一番大事业。否则,如果我们回到中国以后,父母就会卖掉我。在中国,对那些能吃和任性的女孩子,总是有办法对付的。A 可是不能当饭吃的。”^{[3]42}主人公当时的这些想法和事实有很大的误差。旧中国确实存在卖儿卖女的现象,但是并不是普遍现象,而且没有父母会因为女孩子任性和能吃就会考虑卖掉她。现在的“我”不可能还是这样的认知,只是童年时期父母讲的故事、某些恐吓性的话语以及唐人街浓厚的厌女氛围会让她产生深深的不安,甚至是误解。作者使用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直接描述这些误解,可以让读者更深切地体会到“我”童年时的困惑。

二、后现代叙述手法

后现代叙述手法首先体现在《女勇士》中非线性叙述手法的运用中。传统的作家往往把文本看成一个稳定的、连贯的和封闭的设计,传统小说总是按照故事的时间线索安排情节,具有清晰的开端、发展和结局,作者竭力在小说发展中突出曲折性和传奇

性。而后现代主义文本总是力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延缓封闭,鼓励抽象,保持一种嬉戏的多元态度。非线性叙述手法颠覆了传统叙述封闭的结构,打乱了时间顺序,往往叙述时间和空间都比较混乱,叙述视角总是交替转换。这种叙述方式突出的不是时间的流动,不是完整的结局,而是让读者在小说提供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认识能力,去感受、理解和想象。

从《女勇士》的整体构架上来看,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将全书的五个章节拼接起来,但是几个章节不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而且每个章节描述的对象都各不相同,几乎都可以独立成章。全书充满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凌乱的记忆、想象和心理活动。此外,作品中叙述视角的不停转换也体现了叙述的非线性。例如,前一部分刚刚讨论过的第一章关于姑姑的故事的多重叙述,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滞了,叙述者不停地从各个视角探讨这个故事的多种可能性。

作品的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这种非线性叙述“放大了有色族裔女性所体验的多重压迫和多重矛盾”^{[1]42}。女主人公处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对美国主流文化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都既有认同,也有质疑。汤亭亭将这个华裔少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通过非线性叙述手法进行放大,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她成长的艰难。

这种非线性叙述手法的运用还丰富和发展了女性成长小说这一传统。在传统的成长小说中,成长仪式是典型情节模式,故事往往从主人公天真的童年开始,然后大致依次经历诱惑—出走—考验—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认识人生和自我这些阶段。然而在《女勇士》中,“不同于沃兹沃斯那种浪漫主义式的描述对天真童年的回忆,……汤亭亭描述的是无法提供天真的童年。除了反思个人心理的最深处,她们的主人公需要处理由于她们的种族、性别和阶级而造成的多重压力”^{[1]40}。由于现实的残酷,天真的童年从故事一开始就是缺失的,主人公的成长并不遵循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失去天真之后的迷惘阶段被无限地放大了。

此外,《女勇士》的叙述模式具有典型的巴赫金所强调的那种众声合唱的复调性。巴赫金在分析托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时候指出:“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音(声部)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众多的性格和命运同属于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并按照作者的统一意

识一一展开,而恰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及其各自的世界结合为某种事件的统一体,但又互不融合”^[4]。《女勇士》的叙述模式正是体现了这种经过巧妙设计出的多声部、多指向的复调。

《女勇士》最后一章关于蔡文姬的故事影射出该书叙述者也是通过重新叙述母亲所讲的中国故事,综合两种文化唱出自己的歌,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结合前面所说的汤亭亭在视角方面的突破,可以说《女勇士》是一部复调叙述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至少存在五个层次之间的交互作用:1)被叙述的事件和对象本身;2)母亲的眼光;3)童年的“我”体验事件时的眼光;4)现在的“我”的眼光;5)读者的体会。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在分析不同叙述眼光时提到的第一章“无名女子”里对姑姑事件的复调叙述。女儿的叙述解构了单一叙述人的绝对权威,改变叙述人为主动,接受者为被动的呆滞状态,代之的是叙述者和接受者互动的关系,使得同一事件由母亲、幼年的女儿、经过50年后撰写此书的叙述人“我”三个不同视角进行叙述。

最后,作为典型的后现代文本,《女勇士》的另一个突出特色就是“拼贴”与“互文”手法的成功应用。拼贴,是后现代艺术创作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手法,是将各式各样成形的图像按照创作者的构思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新的图案。后现代作家们同样将拼贴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将一些主旨、内容有联系的文本加以组合,使它们相互之间产生作用,形成一个新的语意场。《女勇士》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几乎包含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青少年的困惑与叛逆、女权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口头文学、家庭史诗、古老的民俗与神话、东方话语、红色中国、毛泽东、文化冲突以及个人经验与官方话语等令人感兴趣的成分。

小说最主要的一处拼贴运用,是将中国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杂糅进故事的叙述中。在第二章《白虎山峰》里,叙述者“我”受到母亲故事的启发,不愿长大后仅仅成为人妻,成为一个附属品,而立志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她把自己想象成“花木兰”,进山修炼,师从一对神仙夫妇练功习武十五年,然后替父出征,率领军队,一呼百应,同国王的军队作战,惩恶扬善,成了村民们的保护神。小说中花木兰的故事拼贴进了其他的中国典故。主人公代父从军之前父母在她背上刺字,刻下了所有要报的怨与仇。这是中国典故中“岳母刺字”的故事情节。主人公出征后,军纪严明,爱兵如子,又是

加入了“岳家军”的故事。除此之外,小说还将现代女权主义的思想写入“花木兰”的故事中,如主人公和未婚夫在军营里秘密结婚生子。“《女勇士》中的花木兰故事已经与中国原版本的‘花木兰’大相径庭。后者宣扬的是孝道,淡泊功名以及遵守妇道的儒家思想;前者则塑造了一个当代女权主义自觉革命者的形象,她要报仇,要革命,要建功立业。虽然两个版本之间依然存在着相通的基调,但多种文本、典故的拼贴,已看不出原有故事的意义,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场——美国华裔女性强烈的族群意识。”^{[5][7]}汤亭亭将原故事“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建功立业的儒家理想加以女权主义的解构。

三、成长与反成长叙事的并置

虽然有的评论家如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认为成长小说终结于现代主义的兴起,但是成长小说并没有终结。迈尔斯曾对20世纪的成长小说作过这样的描述:“呈现在现代作家面前的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迈出最后一步,进入完全崩溃、精神错乱的世界,……在那里一切现实都有问题;要么迈出不太激进的一步,把整个小说带到自嘲这个可以拯救的平台——换言之,去创作反成长小说,戏仿这类小说的两个分支,流浪汉小说和忏悔小说。第二种途径在20世纪成长小说中最常见。”^[6]格里高利·卡斯托(Gregory Castle)甚至把现代主义的反成长小说(anti-Bildungsroman)视作成长小说史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成长小说延续了19世纪的“奋斗—覆灭”主调,摒弃了对现实功利的追求转而复兴古典主义梦想,虽然梦想终将破灭,这些小说却以“失败”为最终胜利,向既定的社会结构宣战。

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在不断的挫败、失望中调整自我,使自己的个性和社会共性相适应,从而获得生存的方向,这是一个经典的正向结构。而反成长小说多以成长的失败或错位为主题,反向讨论青少年的成长问题。“在现代‘成长小说’或‘反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并没有得到‘幸福’,也没有为未来作好切实的准备”……“同经典成长小说中那些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相比,他们仍是孩子,并没有长大成人”^[7]。反成长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为极端的表现有死亡、退化,另外有疯癫、极度退缩和逃避现实等。此外,孙胜忠在《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一书中提到另外一种状态,就是孩子在过度社会压力下,往往表现得像个成人,具有成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此来对抗成长。

《女勇士》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正向结构，属于成长小说，但是小说中也不乏反成长的例证。作者在正向成长的主线下安排了大量的反成长叙事。小说的第一章描述的是主人公的无名姑姑通奸生子使整个家族被村民袭击，她自己被家人唾弃，她通过死亡的方式来反抗旧的社会制度；第四章“西宫门外”整个章节描述的是姨妈月兰，她是一位被美国现实社会扭曲的女性，丈夫融入美国社会后抛弃了她，面对丈夫的变心，月兰所持有的传统的家庭观念开始瓦解，她惧怕任何性质的变化，最后导致精神崩溃；第五章描述自己的艰难发声过程，提到女主人公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个沉默的女孩，天天沉默不语，甚至在华人学校里也不说话，她的“反成长”源于其对于成长的焦虑，对融入美国社会的恐惧，选择沉默是一种倒退的、畸形的“适应”，是极度逃避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无名姑姑、姨妈月兰和沉默的女孩都是种族和性别主义的牺牲品，主人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过类似的“沉默”和“疯癫”状态。第一次进幼儿园，不得不讲英语时，她就沉默了，那时她在图画作业上涂上黑颜色，在画出的房子、花朵和太阳上涂上一层层的黑颜色。她用粉笔在黑板上涂来涂去，认为自己是在画幕布，想象着那些幕布豁然开启，呈现出一幅又一幅阳光明媚的场景，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辉煌的戏剧。她默不作声，可每次都为自己的默不作声而感到难堪。她甚至一度认为每家都得有个疯女人，怀疑自己就是自己家里的疯女人，从而表现一天比一天怪异。

在正向叙述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加入这些反向例证，一方面反衬出旧的社会制度以及主流文化强加在少数族裔女性身上的种种标准的残酷性，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族裔女性成长不同阶段面临的多重压力。

另外，前面提到全书是用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述将几个不相干的故事拼接在一起，在叙述者“我”对这些反成长例子的叙述中也能发现“我”的成长。无名姑姑被家人唾弃，甚至在死后也不被家人提起，然而“我”打破了这种沉默和禁声，开始“写”无名姑姑，向外人讲述她的故事，并以此开始了自己的成长之路。借助母亲的眼光，对姨妈月兰如何一步一步变得疯癫的过程进行描写，反映出我

非常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现实巨大的冲突。沉默的女孩和童年时代的“我”很像。“我”憎恨沉默，并私下里偷偷地折磨小女孩，想让她说话。“我”对她的折磨反映了“我”渴望“发声”的愿望。最终“我”写出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开始“发声”，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四、结束语

《女勇士》使用多重叙述视角复调叙述“我”童年的故事以及“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第一人称经验视角的使用使读者身临其境，更深刻地体会到“我”成长过程中来自多方的压力；使用后现代拼贴手法解构中国的传统故事和传统形象，为反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服务；将成长与反成长叙述的并置反衬女主人公的成长。《女勇士》在叙述视角和叙述手法上的一些尝试丰富了女性成长小说这一传统，更深刻地描述出了华裔女性成长过程的艰难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参考文献：

- [1] Feng Pinchia.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A Postmodern Reading[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 [2]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3] 汤亭亭. 女勇士[M]. 李剑波, 陆承毅,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8.
- [4]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3.
- [5] 张晓华. 众声喧哗的后现代剧场: 论汤亭亭小说的后现代品质[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13(3): 77-80.
- [6] Miles D H. The picaro's journey to the confessional: the changing image of the hero in the german bildungsroman[J].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74, 89(5): 980-992.
- [7] 孙胜忠. 德国经典成长小说与美国成长小说之比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33(3): 319-324.